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WILL THE
REVOLUTION BE
TELEVISED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dia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媒体的 马克思主义 分析

杨倩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媒体的 马克思主义分析

WILL THE REVOLUTION BE
TELEVISED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dia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著 杨倩 译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著; 杨倩译. —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11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ISBN 978-7-5657-2401-5

I. ①媒… II. ①约… ②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3293 号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MEITI DE MAKESI ZHUYI FENXI

著 者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译 者 杨 倩
策划编辑 曾婧娴
责任编辑 曾婧娴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6.5
字 数 12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401-5/G·240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刘东建

执行主编：杨 倩

编委会委员：段 鹏 张 付 隋 岩

鲁 路 雷跃捷 刘东建

王锦刚 任孟山 杨 倩

约翰·莫利纽克斯，社会主义作家、活动家，曾任朴茨茅斯大学讲师，现居都柏林。他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政党》（1978）、《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什么？》（1985）和《伦勃朗与革命》（2001）。他还是英国和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

出版说明

该书是英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关媒体批判方面的新作，其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批判在西方社会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本书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是英国的学者和作家。他退休之前曾经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隐退到爱尔兰之后成为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积极分子。他曾经是大学讲师，组织过抗议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等方面的政治运动。他写的公告《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民主》备受关注，文中表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更加民主的观点使得英国共产党将其称为“忠诚的反叛者”。他还开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艺术的”为主题的博客。他的著作《关键是改变世界》入选泰特的利物浦展览“艺术向左转”，展现了艺术在改变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作者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来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尽可能地以合法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所处的环境与他所采用的方式都有着特殊的背景，因此在某些观点的表述上稍显偏激，但为了保持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本书出版时未作处理。所以在阅读这本书时，请联系上下文，不宜脱离语境。阅读时请细加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序

中国传媒大学一直以培养信息传播领域高层次人才为己任，为党和国家的传媒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及传媒人才的摇篮”“信息传播领域知名学府”。近年来，学校确立了面向未来，走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发展之路。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此为指引，服从和服务学校发展大局，围绕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进一步彰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基地、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研究高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传媒政治、传媒伦理与道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成果。

2018年恰逢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专题策划、精心筹备的基础上推出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为主题的译丛。该译丛的出版正当其时，同时也是对世界政治与经济新形势的积极回应。受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得到重新认识和重视，许多长期坚守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的学者陆续出版了不少富有新时代气息的新著作，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热潮。其中在与媒体传播相关的领域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对大众媒体、新闻传播、信息社会和新媒体的新现象进行批判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面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涨的国际学术背景，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仁们深感责无旁贷，决定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立足于本土情怀的国际视野优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媒学者的学术动态展开了长期关注和跟踪对比，经过审慎考察和仔细甄选，精选了一批学理扎实、立场鲜明、学术规范、具有前瞻性、业界反响良好的外文著作，组织了翻译队伍对其开展攻关研究，积极推进了相关领域的教研工作和学科建设。该译丛的出版对于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一是将填补国内相关学术译界的前沿空白；二是将丰富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三是将为建构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付教授，她的事业使命感让她敏锐地意识

到发起和促成该套译丛的重大责任，并全力寻求多方支持、亲自督阵、周到安排；感谢杨倩副教授，她积极参加策划、甄选、翻译、联络等工作；感谢已经承担翻译任务的王锦刚副教授、吴俊博士等青年教师，他们的辛勤付出使得该套译丛得以稳健推进；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同仁，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使得该译丛能够有条不紊地如期出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应有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我们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科学理论。相信该译丛的出版，能够通过比较甄别、去伪存真，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编委会

2018年10月

导 读

新媒体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媒体发挥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功能，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第四权力”。这项试图体现相对独立性的权力其实仍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西方社会必然体现资本逻辑。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英国舆论媒体时所指出的：“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仅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这种批评揭示了西方媒体的普遍现实，“第四权力”往往沦为西方媒体集团垄断的资源，难以充分体现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公共精神，甚至在单向度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趋势下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因捍卫公共精神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方面乏力，且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主要追求，西方媒体被诸多评论家质疑为滑入资本逻辑苑囿的、猎取受众好奇心的吞币机器，因而成了为资本逻辑代言的社会力量。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媒体的权力幻象，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景观——日常生活因资本逻辑而扭曲为货币的各种符号，长期处于异化状态的现代人感到人格的缺憾和自由的困境，体现了文化批判的独特价值。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方面作出不俗的努力，他们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形式的过程中试图实现文化重塑，使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自主地表达情感和观念，摆脱资本逻辑笼罩下的文化统治。

英国政论家约翰·莫利纽克斯以更直接的方式批判西方媒体的资本逻辑，他通过分析大量媒体资料和案例，批判西方媒体产生偏见的实质、根源及其影响，出版了《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这部体现西方左翼政论家浓重批判力度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如何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如何只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从而塑造了大众的媒体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大众生活。

莫利纽克斯的分析紧密围绕诸如“默多克窃听丑闻”等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展

开，因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直面西方媒体的真实。媒体实现自身的社会功能，无疑基于对当下真实的记录，因而具有历史价值。但是，当人们随作者的笔触走近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发现西方媒体失真的情景时，可能更新对西方媒体的认识：当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展现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时，必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底层大众的抗争，为统治阶级的既定利益服务，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在制造认同的过程中烘托出一种“必要的假象”。

因此，探究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必要将一部分过失归咎于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为公众的判断和选择提供了一些“常识”，这些被修饰和包装的“常识”误导了公众，形成了一些有问题的公众意见。莫利纽克斯认为，西方媒体已经深陷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而纯然公正的、中立的、不带偏向的报道其实并不存在。西方媒体持有诸多偏见的本质在于资本逻辑的束缚，因为它从根本上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造就的。西方媒体具有强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有些声称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独立报道实际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形象而精心策划的谎言，这些偏见左右了媒体报道的风格和内容。

莫利纽克斯为此分析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技术化手段，例如以生产“娱乐化”节目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在娱乐节目中表达政治立场，通过现金奖励“诱惑”底层大众做出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各种“真实”的幻象。流行的肥皂剧为大众展现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但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平凡生活其实并不值得过。作者以《东区人》为例说明，它的主人公并不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剧中少数族裔代表不足甚至被忽略了，这导致该剧展示了几乎完全非政治化的生活图景。这与伦敦东区长期以来“格外政治化”的实际并不相符，在这里发生过的历史上重要的工人运动都被隐去了，貌似“无政治倾向”的政治倾向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做法被作者视为所有肥皂剧和大众媒体的“典型”。

广告在新媒体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强化了媒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广告与西方媒体之间的互动，促进了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维护资本主义的西方媒体在广告收入上颇为可观，而左翼媒体的广告则聊胜于无。其中也反映了媒体对传统权力的依赖关系，依赖传统权力的媒体当然不能纯粹体现公正立场。在莫利纽克斯看来，广告文化其实是一种惯常“撒谎”的文化，人为策划的广告内容和花言巧语的广告语言都是推销商品的包装。如同播放广告一样，媒体输出的内容只是他们想让公众知道的，这些被精心策划的内容塑造了公众的口味，使之不至于产生与上层人士不同的媒体选择。其实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西方媒体滋养着商品拜物教，加重人们的“异化”，使人们在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放弃可能的选择，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

西方媒体何以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善于投其所好，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它知道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且以娱乐节目、喜剧和梦幻片捆绑一些观众并使之长期产生精神的依赖，其实质不是传播公共精神、维护公共利益，而是捍卫媒体的利益本能。这些体现利益本能的策划和实施当然都是在暗中操作的，表面上西方媒体还要表明，这些节目都是为受众提供“一勺糖”，殊不知，这勺糖只是“有助于服下苦药”。莫利纽克斯进而分析西方媒体的权力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大众的想法。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指出以公众名义标榜自身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是由资本的利益集团控制的工具，体现着明显的政治力量。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几乎不能脱离媒体而存在，与媒体相伴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的力量。当媒体体现较强的政治倾向的时候，必然对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不能轻易操纵受众的政见，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成为形成公众意见的因素之一，甚至成为很关键的因素，因而西方政党十分重视媒体的力量。

莫利纽克斯还指出，媒体对某类事件缺乏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强，对具有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弱。由于缺乏经验，受众倾向于相信媒体呈现的“事实”，进而为媒体的意见所左右。这在西方选举时最为常见，西方媒体有针对性地为受众提供信息，对不同的人群产生有针对性的影响，从而影响选票的流向。所以，有时媒体与其说是在进行报道，不如说是在编排叙事，这些引人关注的故事塑造了公共生活中的“真实”。为此，莫利纽克斯提出应对媒体的策略：既然已无法在生活中大规模拒斥媒体，那么不如在纷繁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识别媒体的意识形态导向，进而更好地运用媒体。

莫利纽克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读懂媒体的最有效的框架，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分析世界，在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时代仍然彰显着批判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从现实策略看，应当培养在西方媒体中工作的左翼记者，在媒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信息，进而实现媒体中的斗争。他特别指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现实功能，认为它们已成为潜在的民主化力量，近年来新媒体的潜力在变革运动中增长，在线交流可能会转化为行动。他还分析了群众斗争与新媒体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控制的斗争可能成为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左翼政党因而需要创立和发展自己的媒体，为公众提供资本逻辑之外的另一种世界观和实践方案。

在全书最后，莫利纽克斯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媒体样态，他深知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技术，以及人们的意愿和选择，因而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为了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媒体并为之提供替代方案，他强化了新媒体应有的公共服务功能，描绘了新媒体应有的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决策的愿景。这时新媒体将不再播放麻醉和迷惑公众的肥皂剧，不再渲染各种远离真实的白日梦，不再加重现代社会的异化，而成

为创造新社会的现实力量。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也是作者心仪的媒体样态。综上所述，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媒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对我们理解西方媒体的本质属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某些具体看法体现了其所处环境和文化立场，与我们熟悉的研究理路未尽一致，读者在阅读中当有所辨别。

五年前，我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访学时，曾在一家左翼书店看到这本书，当时觉得这是研究西方媒体的一部很独特的著作。恰巧在同一时期，本书译者杨倩博士也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访学，于是当时我就建议她将本书译成中文，因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传媒专业的双重知识背景。她愉快地采纳了我的建议，将这本小册子带回北京，遂有了之后找出版社、谈版权、安排翻译的计划。最近，她将精心完成的译稿发给我阅读，并嘱我写一篇解读文章附于书中。我认真读了她的译稿，在感谢她的信任、敬佩她的努力、欣赏其流畅的译笔之余，再次感到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翻译工作，于是有了以上诸字。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7月3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目 录

序 言	001
前 言	005
1 媒体偏见	009
媒体偏见的实质	012
媒体偏见的根源	016
偏见的影响	019
2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022
游戏节目	025
肥皂剧：《东区人》的案例	029
广 告	035
3 只给读者他们所需要的吗	04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媒体选择	042
一勺糖	046
4 媒体有多强大	049
媒体与统治阶级	050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	054

5 与媒体斗争	063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065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068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070
群众斗争	073
政治组织	075
6 资本主义之后的媒体	077
附 录	081
默多克丑闻——他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媒体	081
丑闻事件时间表	084
后 记	086

序 言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的两个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默多克窃听丑闻”和2011年8月的“伦敦大骚乱”。 1

“默多克窃听丑闻”表明：其一，《世界新闻报》及其新闻集团厚颜无耻；其二，构成统治阶级不同派系的机构（政客、政府、警察、出版机构等），名义上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是密切合作的；其三，到了紧要关头，默多克及其集团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难以撼动。如此一来就增强了我的一些主要论点，我也因此在文稿中吸收了一些有关默多克丑闻的评论。我还在附录中收录了我写的有关这一丑闻事件的文章，这是一篇给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报》写的文章。

有关“伦敦大骚乱”的媒体报道，于8月6日星期六在托特纳姆区突然爆发，然后快速蔓延到伦敦的其他区和英国的其他城市，它被证明是俗套报道的典型案列。我在第一章论及有关游行报道时，指出了媒体长期以来如何运作“一种堪比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游行进展平静，即使规模很大，通常无法见诸报端……如果相反，出现一点冲撞或者‘动荡’，媒体就会大幅报道，但矛头却完全指向游行”。于是我写道：

曾几何时，相似的媒体“风暴”早已多次被煽动起来对付游行，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区的SWP“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那些从“民族阵线”中分离出来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84年在欧格里夫区的大批矿工纠察队，1990 2
年的“人头税”暴乱，1999年在威林区“反纳粹联盟”向英国国家党总部行进时与警察对峙，当然，还有2010年11月、12月发生的学生游行。而且，这些风暴总是导致示威者个人被举证或起诉，同时还为“惩戒性”判决做好了准备。

针对大骚乱刮起的媒体风暴异常猛烈而且几乎众口一词。《卫报》已经在线登载

了8月9日星期二这一天各大主要媒体的头版。¹这里提供一些例子：

《每日快报》：“痴人嚣张——恶棍和小偷威胁着英国街道”

《每日邮报》：“暴乱肆虐”，辅以评论框里说的：“谴责镇压是不地道的，如同说风凉话。这简直就是纯粹的罪行。”

《每日电信》：“暴徒的统治”

《独立报》：“暴徒当道”

《每日之星》：“英国的无政府状态”

《每日镜报》：“游民当权”

《都市日报》：“骚乱：躁动四散”

与这些如出一辙的报道相比，唯一例外的说法，是《卫报》相对中立的“为伦敦而战”和《金融时报》独家优先关注的“受美国评级下降影响的股票暴跌”。有意思的是，《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之星》都采用同一幅照片，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的蒙面暴徒；《独立报》《都市日报》都刊登了一幅非常相似的照片，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的另外一位骚乱者；《每日电信》《卫报》《每日镜报》则登载同样的照片，从一栋燃烧的建筑跳出来的妇女。换句话说，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重复和强化着政府、警察已经达成的谴责和抨击骚乱者的同盟阵线。

3

这些谴责的核心就是大卫·卡梅伦一口咬定的“纯粹罪行”，也就是认为骚乱没有政治动机或者政治及社会背景。卡梅伦作为首相，想必应对导致该事件发生的政治、社会背景负责，他在宣称与此无关时有着明显的既定利益，媒体不仅赞同这一站不住脚的声明，还制造了一种对持不同看法的人怀有敌意的舆论氛围。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播放了采访资深黑人激进分子兼广播员达库斯·霍恩（Darcus Howe）的片段，他在其中称骚乱为“叛乱”，谈到了警察的种族主义和对年轻黑人的骚扰。采访者菲奥娜·阿姆斯特朗（Fiona Armstrong），知道这不是应该谈论的那一类言辞，立马转为抨击，并且说霍恩本人曾经是一个骚乱者。²后来，BBC为阿姆斯特朗的评论道歉，但关键是如果她犯了这对她来说是经过三令五申还明知故犯的错误，等于是丑化和边缘化了任何挑战共识的人。

这段视频再一次加强了本文的大体观点：

1 资料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media/gallery/2011/aug/09/uk-riotsfront-pages-in-pictures#/?picture=377707624&index=0>。

2 资料来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biJgILxGK0o>。

(亲资本主义)偏向也影响着如何引导访谈。被访者如果是一位“遵从”主流的政治家,与他/她是一些“极端分子”或者“异见者”的代表,即反资本主义者,采取的调子和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因为……

媒体人——功成名就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等,在各自岗位上深谙其道,练就了各尽所能去把脉、去觉察动态的本领,不是那么在意普通大众,当然不会体恤工人阶级,而是体察中产阶级尤其是权势集团。

就我看来,这些“媒体风暴”总是为“惩戒性的判决”铺路,对暴乱的反应证实了这是一种报复。无数得到发表的评论文章称赞“法庭已经对抢劫犯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严厉判决(《太阳报》)”¹;希望“警察把这些网络肇事者抓起来以煽动罪控告他们”²(理查德·小约翰);抱怨“英国左翼自由主义当权派的过分关切”³,并谴责任何企图进一步了解的尝试,就像托尼·帕森斯在《每日镜报》中写的:

试图理解骚乱者的感受就像试图理解一位将靴子压在你喉咙上的人一样……坦白说,亲爱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当下没有同情心。我们只是想看到骚乱者突然倒下在污浊里自作自受……骚乱为什么发生?因为我们和很多人渣生活在一起。⁴

也可以将此类新闻视作“盲目伤害”而不予理会,但是这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尝试揭开这类新闻报道的原因,并且揭露它为谁的利益服务。

在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我就像任何其他激进的媒体批评人士一样,特别受益于我应该在此致谢的两组先锋作品。第一,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Greg Philo et al)在一系列著作中,从1976年的《坏新闻》开始,已经提供了不列颠电视新闻报道的法庭剖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对于统治我们社会的人的系统性偏见。第二,诺姆·乔姆斯基与爱德华·赫尔曼一起,在《制造认同》(Noam Chomsky with Edward S Herman, 1988)、《必要的假象》(Noam Chomsky with Edward S Herman, 1989)和无数文章中已经对美国媒体开展了同样的工作。即使我的结论与这些作者的有所不

1 资料来源: 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sun_says/244723/The-Sun-Says.html。

2 资料来源: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23898/London-riots-Red-sky-night-Tottenhams-alight.html>。

3 资料来源: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2028417/DOUGLASCARSWELL-These-people-shoplifters-looters--looted-society.html#ixzz1VfCXhgIf>。

4 资料来源: <http://www.mirror.co.uk/news/top-stories/2011/08/13/uk-riotstony-parsons-the-britain-we-knew-has-gone-for-ever-115875-23340566/>。